李欣茹，黄岩. 家庭责任场域对农户家庭策略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豫西L村的经验考察［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90-98.
LI Xinru，HUANG Y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field on farmers′ family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farmer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1）：90-9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1.010

家庭责任场域对农户家庭策略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分析

——基于豫西L村的经验考察

李欣茹，黄岩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社会转型激活和运转了家庭责任场域，推动了农民家庭策略的演变，也增强了家庭发展能力。农民家庭策略呈现出家庭成员劳动时间彼此嵌套的自我挤压、主辅工作相配合的效率最优配置以及基于人生任务考量的消费优先次序等特点。这一家庭策略生成的核心机制在于农民家庭责任场域。责任场域是由现代婚姻市场的高标准物质条件以及小亲族村庄社会性质影响下子代婚配的刚性目标进一步激活，并且是在夫妻、代际、代内不同责任类型的相互作用中组织运转，以催生家庭策略、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但家庭责任场域强化后在迎合现代婚姻市场要求的同时，也再度延长了代际剥削链和加剧了本地婚姻圈竞争。

关键词：家庭责任场域；家庭策略；家庭发展能力；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1-0090-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家庭发展的政策视角中，家庭是被当作被动的客体，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予以支持和保障。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作用之下所呈现“去家庭化”的社会样态，我国虽然整体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结构简化的发展趋势，却只是形式核心化。在具体实践中由于仅有针对弱势群体的补缺型福利保障，家庭需通过市场承担国家退出的养老、抚幼、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家庭功能的完成仍然依靠亲属网络[1]，所以我国总体的社会发展趋势是“再家庭化”[2]。当前，许多学者注意到在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中家庭韧性被削弱，在生产与生活中常遭遇困境，其中家庭功能日益被弱化、外化、转化以及社会化，出现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3]、机会和权利缺失下的可行能力贫困[4]等问题，认为处于如此状况的家庭急需由政府干预的“家庭主义”政策[5]。近年来，学者提出“发展型家庭政策”，试图在“再家庭化”的基础上，分别以家庭和个体为对象完善福利保障体系[6]，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应对现代社会风险[7]。在现代性语境中，家庭政策以一种外部性视角认为家庭是急需国家扶持的脆弱客体，应以普惠性保障弥补补救式保障的不足，但政策的思考惯性并未真正揭示家庭的内在结构、成员的角色担当等，也就忽视了家庭在预防和应对风险时的能动性。

社会学视野中的家庭韧性反而在现代化转型中被激活与重塑，表现出旺盛的适应力。在家庭场域中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老人的反馈模式历来就是中国家庭社会的基本底色[8]，即使现代

收稿日期：2022-02-25 **修回日期：**2022-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业转移背景下企业劳动体制变迁与工人权利保护研究”（17BSH146）；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17JZD019）
作者简介：李欣茹，研究方向：基层治理，农村社会学。

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表面形态呈现“分”，但转型时期代际之间的功能性合作才是其实质[9]，特别是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民家庭。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农民家庭代际劳动力配置出发，发现代际合力已经深度嵌入到子代参与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竞争之中，并且代际合力的强弱造就子代家庭发展能力高低的区域差异[10]、地区内部男性婚配的梯度特征[11]以及是否具备进城能力[12]等等。农民家庭的资源、权力关系、伦理等内在结构要素在现代性压力的激化下发生新的变迁形成新的实践形态，即“功能性家庭”[13]，这其中充分展现了农民家庭基于理性选择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的策略抉择，反映出家庭的主动性及适应性。笔者在华北农村地区的调研中发现，在面对现代婚姻市场的高标准物质条件以及子代婚配的刚性目标时，家庭的主动性并不是家庭成员的随性而为，而是表现出一种巧妙的、超理性的、有秩序的家庭策略。可以进一步提出，催生家庭策略、展现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机制是什么？而这一内在机制才是农民家庭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2020年7月对豫西L村为期20天的考察以及2022年3月的电话回访，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访谈对象是适婚青年男女、待婚子女的中年父母以及村庄邻里等。

二、农户家庭策略的实践特征

“家庭策略”这一概念发端于大工业时期，是西方学者用来探讨家庭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时机”，目的是将个人、家庭和社会变迁相连结以反映家庭对社会的反作用[14]。家庭策略的分析视角有利于将家庭内在微观结构变化与宏观社会变迁相结合，是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家庭安排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国内也有学者从“家庭策略”的视角出发，研究改革开放时期夫妻异地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15]、教育属地限制下流动人口家庭内部互动模式[16]等等，展现了家庭在社会变迁中的主动性和适应性。面对现代婚姻市场水涨船高的物质化要求，豫西L村的普通农户动态调整家庭行为模式，形塑了对抗挑战的独特家庭策略。

（一）农户家庭策略的经验呈现

内部劳动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使不同年龄段村民劳动力变现，对农户家庭策略的形成具有客观基础性作用。豫西L村共有耕地面积108公顷，退耕还林面积18.67公顷，林地面积200公顷，有10个居民小组，360余户、1520余人。L村所在市区人均GDP排名常居全省前四名，2012年在传统炼钢、炼铅工厂的基础上，引进富士康，进一步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L村背靠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于2019年底完成了三个村民小组的整体搬迁以及投资额约3亿元的商业街建设，是一个正在开发中的旅游型村庄。区域间的发展合力助推工作机会丰盈的本地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形成，因此村民都可以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完全就业。55岁以上的老年人多选择在商业街做环卫工人、保安、工地工人等；中年人则依据经济基础和居住位置选择经营农家乐、饭店、商店或者是市区打工、承包小工程等工作，目前本村大约有40家农家乐，并且数量在逐年增加；30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多从事商业街高端民宿和商铺服务员，男性多于市区打工或做小生意。

家庭策略是农户为应对社会变迁而发挥自身能动性与主动性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家庭成员依据客观机会以最优效率配置劳动力，以在家庭发展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获得最多的资源积累，实现家庭目标。不仅如此，家庭策略中还包括普通农户对于家庭成员的角色功能性安排，父代是责任主体，子代责任次之，并且在子代中依据性别展现出一种“残酷的理性”。L村的普通农户家中基本均呈现多类型职业组合的状况。村民王菊一家四口，儿子28岁、女儿23岁，均未婚，目前家中共有六份工作，分别是农家乐（仅供住宿，有两个三人间、四个标间）、商店、景区门卫、0.33公顷田地、富士康工人和民宿餐饮管理者。家庭成员的分工均由王菊安排。丈夫在景区当保安，工作时间的安排是干三天（24小时制，不回家）休息三天。当休息日时，由丈夫负责清洗住客换下来的床上用品和田地农活。家中租种集体土地0.33公顷，租金每年共600元，其中果树地0.13公顷，主要种植桃树、李树、核桃树、

杏树和一些蔬菜，庄稼地0.2公顷，种植小麦和玉米。农田的种植收获全部用于自家日常消耗以及赠送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儿子女朋友父母等等，“高山西红柿好吃，都让他们随便拿”，目的在于维持关系，照顾商店生意，同时也会选择性地多赠送给本村农家乐客源最多的李燕家，以获得其所分配的顾客，“我也送的不少，她多少会给我分一些（客人）吧”，保障自家农家乐生意。王菊的工作是日常照看商店、做饭、打扫农家乐的卫生，因胳膊伤痛无法高处晾晒衣物，从而清洗顾客更换的床上用品主要由丈夫和儿子完成。王菊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是早上五点起床，开店、做饭，女儿会七点半来商店吃早饭，八点去民宿上班。王菊清理完毕，会回家收拾农家乐的卫生基本需工作两个小时，若期间有人打电话买东西，还需从家中跑到商店。大约十一点左右回到商店，然后安排午饭。下午两点到四点，若无人，可以休息或整理货架，晚饭时间不固定，需视客流量程度而定，正常情况下晚上十二点之后关门。

在传统观念中，农民家庭以子代男性作为传承整个家族的主轴，特别在华北地区的早先时代有着浓重的“重男轻女”倾向，男性子代理所当然享受家庭资源的倾斜，并承担家族绵延的重担。但随着现代观念的扩散以及女性功能性地位的提升，普通农民家庭成为矛盾的载体，一方面受社会压力侵袭，女性子代被要求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下为原生家庭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女性子代在传统惯习“女儿是别人家的人”的影响下，失去在原生家庭中的权利。这种针对女性子代的理性对待也是家庭应对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策略抉择。王菊的儿子，18岁高中毕业之后外出闯荡，并未赚到钱，2019年回村于景区做一名临时门卫，后因疫情，被裁员。2020年4月进入富士康工作。家中商店收钱的支付宝、微信均绑定的是儿子账户，用于进货以及女朋友的娱乐开销。儿子放假休息时，会抓紧时间在市区进货，顺便开车送回家，之后便清洗床上用品，用完晚饭后，开车回市区。女儿，20岁时开始打工，现在一家民宿中担任餐饮管理者，工作时间早八晚十，王菊不会给女儿分配家中任何工作，“（因为）女儿是要嫁出去的”，但私下却表示女儿比较懒。女儿将打工积累的5万元用于民宿装修，换得相比于哥哥所住稍大的房间，王菊表示“若她哥哥结婚了，她还是要让出来的”。

（二）农户家庭策略的重要特征

家庭策略安排是一个家庭应对现代化、市场化压力的体现，其核心目标在于获得最多的可支配性收入，以完成家庭目标，充分展现了农民家庭的经济理性和处世智慧。

1. 自我挤压：劳动时间嵌套

在理性的现代劳动力市场中，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遵循市场化的运作逻辑，完成自身的工作份额。但当家庭逻辑对接市场准则时，个体的双重角色使其需承担双重规范的要求，在达到市场客观标准之后，作为家庭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主动性满足家庭需求，可见家庭策略是双重规则协调之下的结合体。这一策略能够运转的重要机理在于人员配合与时间统筹。景区门卫和工厂工人有其自身固定的时间安排，商店和农家乐生意是自家经营的灵活性存在，当三个人需完成四份工作时，只能以灵活时间对应灵活工作，丈夫与儿子休息时需帮忙清洗床上用品从而与王菊配合完成农家乐工作，因儿子工作区域的便利性需在休息时顺便进货从而协助王菊完成商店生意的经营，这样以个体往返周转为依托的协调配合，一方面使得王菊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单独兼顾家中的商店和农家乐生意，另一方面节省了王菊专门进城进货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无疑是将三人的劳动时间进行高度嵌套与整合，只是每个人需对自我休息时间进行高度挤压，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最大的工作量，最大可能地实现家庭资源的最多积累。如此的劳动时间安排充分体现了农民所具备的勤劳、计算、忍耐等能够创造中国奇迹的理性特质[17]。

2. 效率最优配置：主辅工作配合

农民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深知赚取金钱的不易，因此在其认知中常以可见的物质收益为参照标准，认为花费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经济最优化配置，虽然他们往往会忽视时间成本，其结果并非是时间—收益维度的效率最优配置，但这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遵行的行为策略

之一。近年来，L村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市区就业机会的增多，村民更倾向于物质积累更多更快地做生意或打工，渐渐退出农业种植领域。农家乐生意的蔬菜消耗，也基本靠市场供应，但本地历来是瓜果蔬菜种子的培育基地，农作物品质更好，农民家中日常食用仍喜欢自家种植的农作物。王菊家中的0.2公顷瓜果蔬菜种植可以定位为六份工作中的辅助性工作，主要是用来辅助其他工作实现效益最优化。0.2公顷土地的所有收获物除了自家消耗外全部通过商店的客人流动赠送给街坊邻居，“从来不卖，也卖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大家一起吃了嘞”。这样将不值钱但消耗大量劳动时间所种植的“几根菜、几个西红柿”进行赠送的行为，反而可以激活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人情关系，并且可以进一步增加商店和农家乐这一类主要生意的客流量，“我们家以前的老店就是那里生意最好的，边上那一家就没我家人多，现在也挺好的，街坊邻居都喜欢来我家”。农民实际是潜移默化地实现了主要工作和辅助工作的配合，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农民在村庄长久生活中所形成的处世智慧。

3. 消费优先次序：人生任务考量

基于经济基础不足、内生资源有限，农民家庭力图以人生任务为考量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可体现在积累与消费两大维度之上。相对于鄂西农村家庭策略的消费导向，华北农村更倾向于积累[18]，其父代历来坚持先积累后消费的行为方式，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实现为子代顺利婚配的家庭发展目标，推动家族延续。而在家庭资源的消费维度上，家庭成员遵循“先子代后父代、先儿子后女儿、先未来儿媳后儿子”的消费结构，家庭资源倾斜对象的首端是未来儿媳，最末端是农村父代，并且消费额呈逐渐递减趋势。王菊将商店收款绑定儿子账户的目的就在于让儿子有足够的资金稳定这段交往，将未来儿媳置于家庭消费次序的优先位置，以保持其对儿子和家庭的好感。女儿在20岁外出务工之后，家庭不再支援其任何物质开销，在其未出嫁之前仅提供基本餐食与住宿。“女儿是别人家的人”，在华北地区女儿出嫁后从夫居的传统，使得女性脱离原生家庭加入新的家庭，因此在原生家庭资源分配中自然排于儿子之后，但这种认知偏好也是家庭资源不足的客观反映。

三、家庭责任场域的激活与运转

家庭策略是家庭在应对社会转型时所做的合理安排，可视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集合体。农民家庭策略所形成的决策合集，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现代性强大压力的倒逼结果，但更为关键的是家庭内在责任场域的组织运转成果，也是决策诞生与实施成为可能的基础。场域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中“场域”被指称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种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19]，并蕴含着兼具目标性的行动力。而责任场域可理解为是在家庭区域内占据不同位置、扮演各异角色的家庭成员，其天然被赋予的各类责任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家庭男性子代处于适婚阶段的责任场域中，尽管最终家庭发展目标指向子代个人，但并不单纯指涉的是父代对子代的无限责任输出，子代同样尽其所能的“懂事”，因此展现的更是一种家庭合力，是成员间的通力协作，特别是针对资源基础薄弱的普通农户家庭，每一位成员的任何一份责任都至关重要。

（一）家庭责任场域的激活

伦理责任历来就是中国家庭的底色，而农民家庭受社会转型压力的影响，内含于其中的责任场域被进一步激活，迸发出巨大潜力。L村属于高山地区，交通不便、封闭性强。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烟草种植占用大量劳动力，村民于2010年之后才陆续进入到 “以中心省市为轴的区域劳动力市场”[20]，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21]，而这部分村民正是目前拥有适婚子女的70后，教育水平低、劳动力变现能力弱、中西部区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因素促使普通农民家庭普遍存在资源基础薄弱的境遇。

当前，内生资源有限的普通农户却处于现代与传统两大力量的压力之下。一方面是女性主导下呈现高标准物质化需求特点的现代婚姻市场。受性别挤压和女性外流的影响，本地婚姻市场中女性婚配资源竞争激烈，男方家庭需不断抬高自身比较优势，满足女方的索价要求[22]，致使婚备刚性局面逐渐形成。现阶段，婚备“要价”表现

出种类刚性必备、价值弹性必备的特点，即彩礼、房、车等这些婚备已成为基本种类必须配置，否则婚配失败，但每一种在符合“行情”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价值弹性。2022年，本地一个儿子彩礼是16.8万左右，两个及以上至少18.8万，而城里婚房已是硬性要求，因位置不同首付需40万～45万，车子也成为必要条件，在不追求品牌的情况必须价值6万元以上。从2015年至今，本村已有60%的农户在市区至少有一套房子，其中40%农户属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预先购房，余下的60%农户属于迫于女方要求临时买房。另一方面是对外竞争对内团结的小亲族村庄社会，这一传统村庄性质是影响农民家庭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村庄社会结构差异，可将中国农村分为多团结型村庄的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的北方地区和多原子化村庄的中部地区，其中华北地区的农村是典型的多姓杂居分裂型村庄，对内保持五服合作范围的小亲族行动单元[23]，对外则表现以“面子”为核心点的竞争性，形塑了以代际关系为纽带的强代际责任的家庭内部结构。在华北农村，子代能否顺利婚配事关父代在村庄内部的面子问题，“若儿子结不了婚，是这个父亲无能”，因此面对水涨船高的婚备标准，子代自身无能力独立承担，从而个体发展目标转变为家庭人生任务，需家庭结构中以父代为主力发挥关键作用，协助子代顺利完成人生跨跃。高标准物质条件的现代婚姻市场以及顺利婚配的刚性目标两者合力，共同激发了农民家庭责任场域的潜力。

（二）家庭责任场域的组织和运转

家庭责任场域是由夫妻、代际、代内之间的不同责任类型组成，内在责任间的有序组织与运转是关键，同时责任的运转是伴随着资源的流动。从相对资源理论视角研究夫妻权力关系，中下层家庭更注重夫妻间经济物质资源的比较[24]。相对应于王菊的家庭结构，王菊长期经营的商店、农家乐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实际的生活交往中王菊也成为了家庭的决策者，主导工作安排和人员配置，丈夫则承担支持与配合妻子的责任，休息之余协助妻子完成农家乐和农田里的体力工作。

就代际间的责任而言，父代对子代主要承担的是抚育责任，但不同性别子代在接受抚育的时间长度和支持力度是不同的。针对王菊家庭现阶段主要的家庭发展目标来说，儿子是父母抚育责任的主要接受者，农家乐和商店生意以及丈夫保安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得用于储存，夫妻两人基本无任何花销，“我们这都是给他（儿子）干”，“女儿是不会要的”，父代是采用自我剥削和强积累的方式以便获得更多资源帮助儿子顺利婚配。受传统男婚女嫁、从夫居等观念的影响，父代对女性子代的抚育期较短、支持力度较弱，王菊女儿在20岁时便开始外出打工，之后父母便不再提供任何经济开销。依据现阶段父代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女性子代对父代承担的是回馈责任而非赡养，是作为核心家庭中的一员主动将三年打工全部所得5万元“贡献”以增加家庭创收途径，减轻父母经济压力。男性子代对父代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本职责任，具体表现为“懂事、节俭、体谅、不辜负父母期望”，因此男性子代并非完全依赖父代，而是尽其所能积累经济资源。儿子18岁高中毕业后便外出闯荡，28岁时回到村庄便立刻找了一份景区检票员的工作，但因疫情被裁员，之后又在市区富士康工厂上班。王菊为进货方便将商店收款的微信和支付宝绑定其账户，“我儿子不会乱花的，知道攒钱，就是给他女朋友买一点东西，交朋友总要花钱的，儿子自己特别节俭，自己在的时候就自己做饭，他知道以后是要买房的”。儿子在休息日时会帮助母亲采购商店货物，回家之后便清洗农家乐床上用品，“累也没办法，家里也就这样，他知道他自己必须干呀，要给他娶媳妇的”，邻里都说“我儿子好、勤快”。俨然儿子作为理性个体同样将满足父母期望，即完成人生重要节点任务的责任演变成规范准则，以指导自身行为。在代内之中，女性子代出资帮助父母装修农家乐，实际也是间接履行支持男性子代的责任，在选择房间时“妹妹出钱了，让妹妹住大房间”。

责任场域中各个部分犹如相互依存的齿轮般有序运转，以启动俗称“家庭”的机器并通过家庭策略的外在表现实现发展目标。普通农民家庭最朴素的愿望就是顺利实现家族的迭代传承，因此当面对极具挑战性的外在要求时，多数农民家庭选择向内团结的自我组织，从而家庭策略呈现

出高劳动强度与低消费欲望、集体性与非个体性的特点。

四、家庭责任场域强化的意外后果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家庭具体形态虽然发生变化，但面对现代婚姻市场的要求，农民家庭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始终是跟随家庭成员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内在系统性的调整，为完成人生任务、履行代际责任，运转家庭责任场域，重构家庭策略，选择向内剥削来迎合婚姻市场的要求，为家庭成员提供庇护与支持，一方面实现了家庭的顺利接续，另一方面也使代际剥削链再度延长、本地婚姻圈竞争再度加剧。

（一）代际剥削链再度延长

“代际剥削”客观上指称父辈与子代之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呈现出来的失衡现象，父辈对子代倾尽全力的付出，但子代并没有尽相应的义务，从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定义为子代对父辈的剥削，但父代不一定认为这是“剥削”[25]。对于L村普通农户而言，家庭资源积累速度尚未赶上社会的现代化要求，因此当父代面临子代结婚这样的重要人生节点时，几乎所有家庭都会向外寻求借款，少则1万～2万元，多则10万元以上，并且均以父亲的名义向父代自己的亲缘网络中的众多亲戚朋友借钱。单人愿借金额大多小于1万，并被要求承诺“在我儿子结婚买房之前一定要还”。在借款之时，多数子代都会同意自己结婚之后一起来承担债务，但根据多数经验显示，现实中总会事与愿违，这无疑使子代婚配这一人生任务再度延长。

案例1：L村监委委员杜国家中有一儿一女。儿子2013年结婚，彩礼8万元，整个婚礼流程总共花费10万元，房子另算。总之，儿子结完婚之后总共有10万元多的外债。这些外债全部都是以杜国的名义向兄弟姐妹借钱，最少的借400元～500元，最多的亲戚借1万，银行贷款3万。杜国采取的策略是先还银行的借款，再还亲戚朋友的。杜国向儿子提过“一起还，儿子一年给1万”，后来儿子也没给，“我没钱，你慢慢还吧”。在儿子刚结婚尚未有孩子的空挡，老夫妻俩去工地干活，“趁着没有孙子不需要占一个人的时候，尽量多赚一些钱”，当时两人一年纯收入是2万。有了孙子之后，老伴在家照顾孩子，杜国自己出去工作。10余万元的债，老两口省吃俭用，5～6年还完。

父代通过超理性的家庭策略迎合现代婚姻市场的要求帮助儿子结婚之后，并无法立即结束这一阶段的人生任务，仍需承担起还债责任。一方面在亲戚朋友无形催促的压力型责任驱动下只能加剧对自身劳动力的剥削，延续子代未结婚之前的家庭策略，在家庭劳动力减少（已婚青年子代退出原生家庭，进入刚组建的核心家庭，劳动力归属也随之转移）的情况下，加大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通过极度节俭来“攒钱”，很多中年或老年父母表示“不会花钱”即为“不知道该如何花钱”。实际展现的是他们没有花钱的欲望，“花钱就是浪费”，“不舍得吃，大鱼大肉也吃不惯，就吃点青菜，也尽量抽便宜的烟”，“也不用买好衣服，10元和100元的衣服都一样。在农村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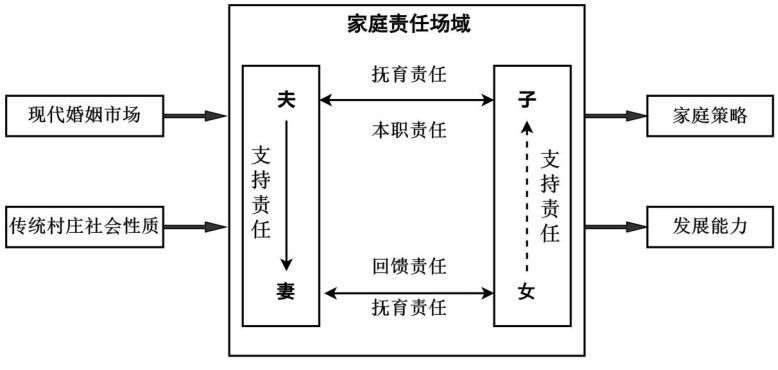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家庭策略生成的一般机制

注：虚线代表间接关系

穿上好衣服，换衣服时还麻烦”，“有钱也花不出去，主要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出去，也没有想过出去旅游，没事喜欢去地里跑一跑，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而“钱”自身的价值就在于“钱花在吃、穿、烟等享受上没意思，最后还是留给孩子好”。这种替子代还债的情况，再度延长了父代抚育子代这一人生任务的自我剥削链，同时也延迟了父代进入下一阶段“协助子代在城市扎根”的时间。实际下一阶段并不意味着父代结束为子代付出，但父代可以承担享受型责任，即照顾孙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人生幸福的体现，“自己没孙子感觉没面子，如果有孙子，带孙子就是一种幸福，就是后继有人，在村里有面子”，同时无外在硬性压力的催促，父代可以承担适度的劳动强度，力所能及地向子代持续输送资源，减轻自我剥削程度。

（二）本地婚姻圈竞争再度加剧

2010年，L村所在市区的房子首付是10万余元，但与女方父母有较大的谈判空间，车子款式也较为灵活，面包车、奔驰等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2015年，结婚有房有车的风气已经盛行，城里房子是否必备的谈判余地已经非常狭小；2018年，市区买房已为常态；2022年，城里房子已是硬性要求，首付大致45万～50万元，轿车也必须价值6万元以上，面包车不行，品牌可以不限。在村庄社会性“面子”竞争的情况下，华北村庄的父代非常期望儿子能够在“最正常”的年龄阶段完成人生大事，便不断发挥自我理性，对家庭生计策略进行调整，试图形成比较优势，以房、车、彩礼、婚礼仪式等作为竞争标的物吸引女性资源。在处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上层村民带动、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婚备竞赛的局面[26]，而婚备竞赛内卷的后果便是婚配标准逐年上调。

通过家庭策略满足婚备条件的家庭会紧接着进入新一阶段的竞争，即“抢占”适宜对象。父代采取的方式是利用自身有限资源在所熟知的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中物色适宜对象，并且受打工潮引起本地女性资源大量外流的影响，父代进一步强化了自身责任，并加快了物色速度，因此在全国婚姻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的本地男性强化了本地通婚圈[27]。对L村许多普通农户而言，若儿子23周岁之后仍无女朋友，父母便开始着急通过媒婆或亲戚朋友打听周边村庄或乡镇的适龄未婚女性。而儿子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候就是春节期间，会被安排多场相亲，甚至会和不同村庄的不同女性青年同时接触，俗称“先占着”，万一“一个黄了，另一个就可以接着，反正最终要谈成一个”。这样儿子便会接二连三被安排与多个女性青年相亲、相处、相知、结婚或分手，整个过程往往会进展非常快，父母须在尚未超出村庄评价体系中的适婚年龄之前帮助儿子物色到适宜对象。

案例2：小王23岁结婚之前，经由父母牵线，在接触了三四个女性青年后碰到现如今的结婚对象。第一次见面两人互加微信，网上聊天两个月后，结果甚佳，便约定双方父母见面。女方父母提出结婚彩礼、车等要求，男方父母全部答应。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由介绍人（村庄能说会道的中年男人担任两家之间的消息传递之人）来回协商城中房子的条件，最终协商结果是房、车、彩礼都要有。男方父母立即筹钱，基本可以支付时，便立即与女方父母商定订婚事宜，并敲定结婚时间，总共历时5个多月。

但结婚的男女青年是否真正了解彼此，是否真正做好步入婚姻的准备？在本地婚姻圈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青年男性似乎是在迎娶适婚对象，而非“妻子”，对女性青年而言，其父代是在帮其择“婆家”而非“丈夫”，这样会损伤真正的婚姻伦理。

五、总结与讨论

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民家庭始终是具有能动性的系统，以家庭成员生命周期为中心应对外界变化，给予家庭成员支持与庇护。本研究是以豫西L村为个案，研究华北地区普通农民家庭在面对高标准物质条件的现代婚姻市场以及顺利婚配的刚性目标时，调整家庭策略、展现家庭发展能力，并揭示出家庭责任场域这一核心机制。普通农户的家庭策略具有其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家庭成员将劳动时间彼此嵌套所进行的自我挤压；主导工作与辅助工作相互配合所形成的经济最优化配置；根据人生任务进行考量所形成的家庭资源消费的优先次序。这一家庭策略形

成的核心机制在于家庭责任场域。高标准物质条件的现代婚姻市场以及顺利婚配的刚性目标两者合力，共同激活了农民家庭责任场域的潜力。家庭责任场域是由夫妻、代际、代内之间的不同责任类型组成，诸如父代对子代承担的是抚育责任，女性子代对父代承担的是回馈责任，男性子代对父代承担的是本职责任，丈夫对妻子承担的是支持责任，子代代内承担的是支持责任。这些内在责任间的有序组织与运转是关键，同时责任的运转是伴随着资源的流动。但这样的家庭责任场域的强化实则是在迎合现代婚姻市场的要求，产生了一些意外后果。父代帮助子代完成婚配时，由于经济基础不足、内生资源有限，仍需大量举债，这样致使父代在子代顺利结婚后仍要承担还债压力，延长了父代在子代婚配阶段的代际剥削链，并且农民家庭竞相通过自我剥削式的家庭策略来获得比较优势，实际是在潜移默化中加剧农民家庭彼此间的竞争，造成本地婚姻圈竞争内卷化的局面。

在现代性理论的话语体系中，农民家庭是脆弱的代名词，终将面临结构分化、伦理异化的局面，“去家庭化”将会成为主流。但在现实实践中，传统家庭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基底，深刻内嵌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行为逻辑之中。身处时代转型中的中国农民家庭的外在形态尽管呈现以“核心家庭”为载体的散点状分布，但在家庭发展目标的内驱力下，家庭实则是以内部功能性结构为基础，并通过亲属系统进行功能性外延，表现出强大的团结性网络连结，并形塑了多样的家庭策略展现出传统家庭伦理价值，激发了农民“韧性”的内在本质。城镇化进程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外在形式，农民家庭通过代际合力发挥其韧性，推动子代进城，并进一步协助子代在城市立足，实现农民家庭的接续和发展。但基础资源薄弱和农民有限的资源攫取能力始终是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客观限制，农民家庭有面对现代性压力的勇气与潜力，不可忽视的是农民家庭是否有对抗现代性压力的持续能力。农民进城的趋势已不可逆，多数家庭通过现代婚姻市场中城中住房这一刚性婚备要求作为跳板开始城镇化，但对于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弱势家庭，其男性子代可能面临“打光棍”的情况。同时，即使子代顺利进城，单靠其自身能力仍无法实现完全城镇化，中国父母“恩往下流”的传统惯习，使其会倾尽所能帮助子代支付高昂的家庭发展成本，而新生代父母也会将更多资源投入于下一代，代际反馈的平衡模式可能会受到现代性压力的挤压。因此，出于保护中国传统农民家庭韧性的缘由，农民可能会利用村庄规则的传统力量反抗诸如持续高彩礼、高规格婚宴等非理性的现代化要素，而政府也应发挥其规制作用，参与农民生活的治理，保护农民家庭的内在活力和抗压弹性。

参 考 文 献

[1]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207.

[2] 唐灿，张建．家庭问题与政府责任：促进家庭发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5.

[3] 吴帆，李建民．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J]．人口研究，2012，36（4）：37-44.

[4] 聂飞．家庭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J]．求实，2015（6）：56-63.

[5] 胡湛，彭希哲．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J]．人口研究，2012，36（2）：3-10.

[6] 陈卫民．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J]．人口研究，2012，36（4）：29-36.

[7]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社会学研究，2011，25（2）：182-216，246.

[8]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233.

[9] 杜鹏，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1）：56-67.

[10] 张雪霖．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43-52.

[11] 黄佳鹏．代际合力、婚姻市场与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82-90，158.

[12] 黄佳鹏．农民进城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J]．兰州学刊，2020（2）：170-181.

[13]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2)：44-60.

[14] 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

庭的一个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2000（5）：100-105.
[15] 潘鸿雁，孟献平. 家庭策略与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J]. 新疆社会科学，2006（6）：84-89，132.
[16] 韩晓燕，文旻. “隐性抗争”与“隐性合谋”：城市新移民家庭策略的互动模式——以上海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初中后教育选择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2）：136-141.
[17] 徐勇. 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J]. 中国社会科学，2010（1）：103-118，223.
[18] 李永萍.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1）：108-120.
[19] 布迪厄. 反思社会学导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5-55.
[20] 周申，易苗. 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开放[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6）：11-18，142.
[21] 贺雪峰. 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1-6.
[22] 董帅鹏. 面子再生产：北方农村婚备消费升级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 中国农村观察，2021（3）：86-99.
[23] 贺雪峰.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 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24] 李建新，郭牧琦. 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J]. 妇女丛，2015（6）：17-23.
[25] 陈锋.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2）：49-58.
[26] 王向阳. 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5）：20-28.
[27] 杨华.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J]. 北京社会科学，2019（3）：91-100.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field on farmers´ family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farmers

LI Xinru，HUANG Yan

（*Facul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30，*China*）

Abstract：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activated and operated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field，promoted the farmer′s family strategies and family development capacity. The family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by family members′ self-squeezing of working time，the optimal efficiency alloc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major and minor tasks，and the priority of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life calling. The core mechanism of this family strategy lies in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field. which is further activated by the high-standard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 modern marriage market and the rigid goal of offspring marri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small kin village. And it is organized and operat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types of husband and wife，inter-generation and within-generation to generate family strategies and enhance family development capacity. However，the family strategy，while cater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marriage market，has once again extended the chain of intergene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intensifie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local marriage circle.

Keywords：Family responsibility field；Family strategy；Family development capacity；Social transformation

（编辑：程俐萍）